

【下册】

LIHAICAIJINGWENXUAN

李海财经文选

◆李海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下册】

LIHAICAIJINGWENXUAN

李海财经文选

◆李海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海财经文选/李海著.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80221 - 623 - 5

I. 李… II. 李…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204 号

李海财经文选

李海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真 (010)68320634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63.5

字数 992 千字

定价 120.00 元(上、下)

书号 ISBN 978 - 7 - 80221 - 623 - 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生活照

目 录

三、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517)
体制改革与财政困境——论超分配以及改革的前景	(517)
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财税改革	(528)
十年改革的反思与财政研究	(532)
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回顾与前瞻	(538)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制	(545)
目前财政经济状况与财政体制改革	(552)
目前我国的财经形势与体制改革	(560)
四、财政赤字问题研究	(571)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571)
财政赤字的历史教训和当前的赤字问题	(583)
当前的财政赤字问题	(589)
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危害	(595)
3098 亿赤字能承受赤字无害论不可取	(598)
五、财政政策专题研究	(602)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综合财政理论与实践的再探讨	(602)
发展财政论——社会主义财政的发展趋势是综合财政	(612)
城市理财新论	(620)
从积极财政说起——“三讲”学习笔记	(632)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建议	(644)
治穷致富是民族地区财政的根本任务	(648)
西部地区经济开发与财政对策	(661)
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财税对策	(688)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和意见	(696)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中若干有关财政问题的研究	(702)
国有土地的财税管理问题研究	(716)
加强国有土地管理规范土地收益分配	(730)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市场管理	(738)
关于预算外资金的界限问题	(744)

第三篇 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	(753)
宏观调控企业财务研究	(757)
论企业的投资与借债	(778)
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新纪元——论《企业财务通则》的成就与 问题	(801)
国家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新政策	(812)
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管理	(829)
现代企业制度与新企业财会制度	(836)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探索与研究	(850)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	(858)
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际	(865)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895)
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管理	(905)
财政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与对策	(912)
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与财务制度改革的理论探索四题 ...	(918)
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财务	(929)
关于股份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941)
记一项未成功的“协议”	(946)
财政与拖鞋厂双方协议要点	(948)
关于国有企业设置财务总监的思考——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监督的 一项重要举措	(950)
国有企业设置财务总监的几点设想方案	(953)

要操作也要研究——致《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封信	(956)
摘不摘“红帽子”的议论——关于乡镇企业改革的故事	(960)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管理初议	(963)
加入 WTO 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976)
谈会计委派制	(980)
论自负盈亏及其他	(987)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发展历史回眸	(996)

三、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体制改革与财政困境^①

——论超分配以及改革的前景

一、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1.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

- (1) 体制改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2) 体制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3) 体制改革要安排好新旧事物的改革界限和数量界限

2. 十年改革的成功与失误

(1) 成功之处：

- 解放思想、纠正失误、拨乱反正、重新走上正确发展之路。
- 调整经济、纠正“左”倾、改革开放、实现四化。
- 纠正管得过死的体制，下放财权、搞活企业、加快生产的发展。
- 理论联系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法，实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打破封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技术，加快建设，进入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影响世界进步。

(2) 失误之处：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否定过多，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

^① 本文撰写于1990年5月。

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矫枉过正，放权超过界限，集中变分散，变有计划为无计划，宏观失控，不得不进行再调整、再纠正。

——强调个人物质利益过度，私心高于公心，“一切向钱看”，削弱了政治教育，淡化了好传统、好作风。以致出现腐败、分配不公，党风政风下降，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

(3)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正确政策

——反对自由化，纠正右倾，重新走上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纠正分散过多，市场调节过多，适当集中，加强计划管理，强化国家职能，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

——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整顿党风政风，摆正公私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四化大业。

——深化改革，不是深化自由化的改革，而是反自由化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正确理解：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一致性，并不矛盾。

3.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艰巨性

(1) 十年改革分为两段：前五年调整的成就，后五年自由化泛滥的失误。失误的结果：通货膨胀，市场物价不稳，社会不安定。

(2) 根本原因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方法上的错误：过去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经济，要改为分散型的自由化经济，才能快速发展经济。换句话说：过去的大干快上是国家一家搞不行了；现在的大干快上要千家万户搞，这样才能快发展。其大干快上是相同的，只是方法不同。因此，过去出了问题纠正及时，而且彻底：现在出了问题纠正慢而不容易彻底。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其难点也在这里。

(3) 治理整顿的方法是减少分散、适当集中。这在1962年调整时期是容易的，在现在则困难。要把下放过多的权力重新交回中央，使中央重新控制局势，相当不易。但是，必须这样做。所以，任务是艰巨的。急不得，也松不得，要稳步治理整顿。必须从理论到实践论清楚，使人们都理解，才能达到目的。时间至少五年，甚至十年。

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国民收入超分配；其次是造成超分配的原因；财政与银行信贷不能平衡的理论和原因。

二、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问题

1. 超分配的争论

1980年物价上涨，我们说是再生产过程中分配出了问题，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原因。有人不同意，说国民收入不会有超分配。争论很激烈。最后，1984年超分配很多，引起1985年物价大波动，才不得不承认国民收入有超分配。但承认是一回事，实际还在搞超分配。以致愈演愈烈，终于又爆发了1988年的过大超分配，引起物价大涨，发生了1989年的混乱。

“超分配”的理论是：

(1)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超过了它的实现数。

是价值分配超过了使用价值可以供给的数量。也就是钱与物的失衡，需求与供给的失衡。

(2) 在纸币发行时代才有大量的超分配。超分配的货币购买力留在人们手上，使购买力大于商品供应，引起了抢购争购，致使物价上涨。

(3) 超分配的计算是个新课题，正在研究，还没有定论。就目前来说，有两种：

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计算。那是将国内的积累（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和消费的需求加上向国外出口的需要，为总需求；将国内的总供给加上国外进口的供给，为总供给。两者平衡，逆差即为超分配。以1982、1987年为例：

	1982 年	1987 年
一、总需求	5370	13004
1. 国内	4956	11583
(1) 固定	1239	3337
(2) 流动	235	975
(3) 消费	3482	7271
2. 出口	414	1421
二、总供给	5243	11542
1. 国内	4885	9991
2. 进口	358	1551
三、差额	-127	-1462

差率%

-2.42

-12.67

二是差额算法，即购买力与商品供应平衡的计算。是将社会购买力来源与购买力的实现（其中主要是市场商品供应）平衡，以其逆差（结余购买力），减去商品库存增加，加上物价上涨消去的购买力，即超分配。以1988年为例：结余购买力1260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增加728亿元，居民手持现金增加532亿元），减去商品库存增加489亿元，加上物价上涨消除的货币购买力1200亿元，等于超分配为1971亿元。即1988年国民收入超分配1971亿元。

2. 十年改革，超分配的情况：

按照上述两种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看，前五年超分配比较少，问题不大，后五年超分配多，问题严重。

——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情况。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总需求	5370	6069	8001	9633	11612	13004
总供给	5243	5804	6864	8659	10235	11542
供求差额	-127	-265	-1137	-974	-1377	-1462
供求差率%	-2.42	-4.57	-16.56	-11.25	-13.45	-12.67

上表是按照上年价格计算的，包括了物价上涨消去差额部分，其差额即超分配。

可以看出，从1984年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额，超分配以上千亿元发展。

(2) 购买力与商品供应差额计算。

年份	结余购买力数额			商品库存增加	无商品供应的购买力	物价上涨消除的购买力	超分配额
	储蓄增加	手持现金增加	合计				
1979	60	45	105	137	-32		-32
1980	140	65	205	121	84		84
1981	138	52	190	155	35		35
1982	158	41	199	128	71	3	74
1983	187	85	272	87	185	75	260

续表

年份	结余购买力数额			商品库 存增加	无商品 供应的 购买力	物价上涨 消除的购 买力	超分配额
	储蓄增加	手持现 金增加	合计				
五年合计	683	288	971	628	343	78	421
1984	323	201	524	-22	546	318	864
1985	389	161	550	103	447	689	1136
1986	533	152	685	196	489	446	935
1987	836	189	1025	621	404	527	931
1988	728	532	1260	489	771	1200	1971
五年合计	2809	1235	4044	1387	2657	3180	5837

(3) 结论

以上两种计算虽然不同,但结论大体相同。

第一,改革十年,后五年超分配严重,而且愈演愈烈。1988年几乎达2000亿元,比前四年多一倍。

第二,后五年超分配共计5837亿元,除去物价上涨消去的以外,还有2657亿元无物资保证的结余购买力威胁着市场。

第三,后五年居民手持现金增加1235亿元,加上活期储蓄约700亿元(按余额2809亿元的25%计算),共有现实货币购买力近2000亿元压向1989年的市场。这就是1989年上半年物价稳不住,继续波动的原因。

3. 超分配的原因

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财政收支分配。银行信贷也有一部分是分配。近十年来银行信用逐渐深入财政分配领域,代替了一部分财政分配。所以改革十年的超分配,主要责任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银行信贷收支不平衡,出现信用膨胀。

财政赤字,是收不抵支,是超国民收入的分配,通过银行变为无物资保证的货币购买力。如果没有银行紧缩货币、信贷去弥补,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致使市场紧张,物价上涨。

信用膨胀,是银行没有资金来源的放款,或者是派生性存款的放款。当然,财政赤字必然引起信用膨胀、通货膨胀,不过这里说的是银行信用本身的信用膨胀,是银行自己搞的通货膨胀。银行的信用膨胀同样引起了

无物资保证购买力的增加，也就是超分配。在没有财政支持（结余）下，也是通货膨胀，致使市场紧张，物价上涨。

过去财政统收统支、分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超分配是财政的责任。在改革十年中，财政资金分散过多，银行又代替了财政一部分分配的情况下，超分配的责任银行也应负责一部分了。特别是财政挤银行，银行挤财政的情况下，两家都有责任。

当然，财政银行的超分配，又受经济政策失误的影响，以及体制改革某些作法失误（过分自由和分散）的影响。因此，下面单就财政、银行信贷、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三、财政困难及其出路

1. 财政困难，难在做“无米之炊”。

一般来说，财政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钱不办事，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收支平衡。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财政是国家财政，执行的是国家政革，办的是国家要办的事。有时候钱少了也得办事，没有钱还要办事，不可避免的非出赤字不可。所以，赤字不是财政所要做的，而是国家财政的职能迫使财政不得不如此。有人批评财政不该出赤字，是不公平的，至少说是一种误解。

2. 财政收入比重下降过多，财力分散过分，不足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

财政收入比重在统收统支的情况下过高，1978年占37.2%，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应当降下来，是对的。适当分散、降低比例是应该的。但十年来放权放钱过多，愈演愈烈，失去了制约，是错误的，应当纠正。

年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年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1978	37.2	1984	26.0
1979	31.9	1985	26.1
1980	28.3	1986	24.9
1981	25.8	1987	21.5
1982	25.4	1988	19.2
1983	25.6		

1988年财政收入2489亿元（国内收入），支出2568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633亿元，行政国防文教事业费和维持生产性支出1935亿元，“吃饭”、建设都不够。

按照国家财政正常需要预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应当有30%。其中“吃饭”部分为22%，建设部分为8%。以1988年国民收入11533亿元计算，财政收入应为3460亿元，比现有财政收入2489亿元多971亿元，其中建设部分占8%为920亿元，比现有基建支出633亿元多289亿元，“吃饭”部分占22%为2537亿元，比现有“吃饭”支出1935亿元多602亿元。可以看出，目前的全都献财政收入还是不够正常支出需求，少了近1000亿元，财政怎能不困难！

3. 现在财政是真困难，全面困难。

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正常支出比较相差1000亿元，所引起的全面困难，是真正的困难。

目前财政是：上难，下也难；左难，右也难；前进难，后退也难。走到了个“死胡同”，没有大的政策改变难以解除。

现在逼得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大家都搞赤字。这几年还有点结余弥补赤字，老底子吃光了怎么办？财政穷到这步田地，我国四十年历史少见的！

这种形势下，上下相互埋怨、指责，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上下左右携起手来，共同研究对策，把分散过分的资金1000亿元重新集中到国家财政上来，才能解决困难问题。

4. 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

讲几个原则问题。

第一，对财政的认识有片面性，措施失当。

财政是国家的财政，是国家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财政政策。换句话说，财政是国家的一种工具，国家运用财政收支实现国家的职能。财政应当听国家（政府）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

但是，财政主要职能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一项经济工作，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国家制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必须符合财政本身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主观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客观存在的规律，否则，不但达不到国家政策的目的，而且有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严重时会导致国家政权的动荡。

国家财政的客观规律，我想至少有这样三条：一是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平衡将影响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历史实践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财权要与事权相一致。国家要财政办多少事，就得让财政集中上来多少钱。换句话说，国家要财政办多少事（比如基本建设投资），就必须让财政收入有足够的钱，去办这些事。“无米之炊”是不能做的。三是财政是国家的宏观管理控制的工具，国家通过财政收支监督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执行国家的指示、命令和计划。过去我们说，财政的重要职责是“守计划，把口子”，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年，在自由化浪潮冲击下，连财政本身也忘记了财政的客观规律，只讲“工具”，服从国家的政策，没有宣传并据理力争按照财政的客观规律办事。财政陷入困境，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

第二，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促使财政陷入困境。

四十年历史证明，凡是急躁冒进，不顾财力的可能大干快上，财政就发生困难。1956年的“小冒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78年的“洋跃进”，以及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过热”，都使财政发生困难。

这一次的体制改革，是针对着过去集中过多，管理过死，统收统支妨碍企业活力和积极性的发挥而采取的相反政策。放权放钱搞活企业的新体制，并没有批判过去的“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与做法。也就是说，批评计划经济集中过多没有达到快速发展经济的目的，要用市场调节，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力，大家一齐上的大干快上办法，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方法不同，目的一样，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未变。这就是经济“过热”，陷财政于困境的实质原因。其所不同的是，集中型的计划经济出了问题容易纠正，分散型的偏重市场调节的经济出了问题则难以纠正。同样的财政困难，前者易于克服，后者难以自拔。这就是当前财政困难中的问题。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助长了困难的广度与深度。

十年体制改革，加大了地方的财力和职权，使地方有权处理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务，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是正确的。但是被夸大了。分权过多，加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致财政体制翻过来掉过去，总是搞不好。明显的缺陷——中央财政比重过小，无法平衡。多年提出调整也调不过来，使国家财政陷于被动。起初中央要收回一些大型重点企业，地方不愿意放；后来提出调整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地方强调发展需要，调整不了，而且特殊体制逐渐增多；中央不得已向地方借钱，借了不还，使地方

增加支出，不搞结余；地方为了怕中央借钱、压支出，都在搞赤字财政，使原来中央财政出赤字变为地方财政也出赤字，大家都出赤字。有些省强调经济发展要有后劲，有意减税让利，藏富于企业，生产发展了财政收入增长不上来。总之，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造成你难我也难，难以调整纠正国家财政全面困难的局面。

6. 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在哪里？我看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变上述政策，纠正过分分散和自由的体制，不适当收回财权，集中上来部分财力（1000 亿元），很难治理整顿，走出困境，达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

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增加收入，从哪里收？自然要向企业收，减少留利数量。那么就要缩小企业的财权、财力，限制活动的范围：那些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藏富于企业，减税让利的承包制和对乡镇企业的优惠，就要改变；要加强管理控制，就要限制企业自主权，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治理整顿时期应偏重于计划调节，以计划调节为主；要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就要向已经发展起来的富裕的地区要钱，改变在十年改革“吃偏饭”、实行特殊政策地区的财政体制，取消或限制其特权，增加它们的上缴收入比例。不向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企业集中资金，向哪里集中资金呢？如果还让他们实行原封不动的体制，继续分散下去，怎么集中，怎么使财政摆脱困境，更好地实现国家新制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呢？！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怨天，不行；尤人，也不行。只有实事求是，认真治理整顿经济，增加国家财政的财力，才有可能解决。

四、银行信贷管理的失误

如果说财政困难是被迫的话，那么银行信贷的困境是自找苦吃。这话有些刻薄，但事实确是如此。

改革十年，银行有很大成绩，但也有几个失误：

1. 存多贷更多，银行陷困境。改革初期，财政下放财权，分散资金给企业，银行存款增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减少了财政收入，增加了信贷资金来源，运用得好，对国家对企业都有益处。可惜银行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资金很多，敞开思想放款，撒开手脚贷款，有求必应，无求送上

门，结果1984年大发货币262亿元。一年增加货币流通量49.5%，搞出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致使1985年的物价波动，不得不紧缩货币和信用，工作十分被动。麻烦的是，在紧缩中，受到了生产“滑坡”、发展缓慢的批评；于是犹豫不决，收收放放，紧紧松松，最终又酿成了1988年680亿元的又一次货币大发行，一年增加货币流通量45%，迫使银行1989年不得不再次紧缩信用和货币。如果这一次紧缩不成，再次出现货币大发行，恐怕银行就更加困难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但愿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治理整顿，解决这个问题，使银行摆脱困境！

2. 误入“禁区”，难以自拔。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银行信贷控制不住，大量贷款搞建设，酿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962年调整，总结经验，认为银行短期资金不能放长期基建贷款，人称银行“禁区”，不能再犯。实行了近20年，效果不错。十年改革的初期，银行体制改革，提出要打破“禁区”，短期存款资金可以搞长期基本建设贷款。尽管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客观规律违反不得，“禁区”破不得，实际上还是闯进了“禁区”。并且，很快在各地各专业银行中间传开，四个专业银行都争相发放基建贷款。新成立的金融机构也在放这样的贷款，而且愈放愈宽，愈放愈多。到1988年底，固定资产贷款余额1559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14.8%，其中半数为基础建设贷款。这些建设贷款，绝大部分是一年以上三年左右才能收回，有些还是没有效益，根本无法收回的贷款，致使短期资金被压不能周转，相对减少了流动资金贷款供应。待到生产发展需要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时，银行资金不足，就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渡过难关。因此又引起了通货膨胀，又不得不紧缩信贷货币。固定资产贷款被压收不回来，流动资金贷款不但不能压，还得增加贷款支持生产，银行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很难自拔。这就是银行打破基建贷款“禁区”的结果，值得再次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困境。

3. 银行企业化，造成了混乱，难以控制

银行是经营货币存贷业务的企业，实行企业化无可厚非，但那是指资本主义的商业银行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就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有双重职能：一是企业，经营货币业务，取得盈余，为国家积累资金；二是国家的银行，代表国家控制管理信贷和货币，执行国家的职能。单纯强调国家银行的企业化，单纯以赚取利差获得盈利为目的，放弃了国家的职能，必然陷入资本主义自由化无政府的境地，危害国家。包括农村信用